

生活點滴

嚴查內鬼嚴懲「黃牛」

馬承鈞

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福海日前偕妻赴京求醫，因病情緊急，無奈在協和醫院花了1,400元買了個專家號。他嘆曰：「原本只需14元的專家號，竟被炒到一千多塊，整整高出100倍，號販子夠狠毒啊！」

這令我想起年初火爆網絡的「東北女孩痛斥號販子」的視頻。有記者對事發地北京市廣安門中醫院和另外兩家著名三甲醫院進行暗訪發現，頂風作案的號販子竟然稱「北京三甲醫院專家號都能買到」、「還能掛平素不出診的名專家號」。連一些醫院保安都與號販子有染，一名保安拍着胸脯大言不慚對人道：「北京69家醫院都有我們的人！」

據北京警方甘家口派出所一警區警長李碩日前在該區域一次抓捕行動中披露，空軍總醫院燒傷科、皮膚科是熱門科室，一些號販子輕易就能從窗口把這些科室原價7元、10元和14元的號掛出來，轉手以300至500元的價格賣給急需的患者。「知名專家300元的號最低會被賣到3,000元，有時甚至能賣到上萬元……」李碩如是說。

這還僅僅是北京醫院號販子瘋狂斂財的「冰山一角」！筆者孤陋寡聞，聽罷這些咄咄怪事真有點驚呆了！視頻中那位東北女孩撕心裂肺的呼喊「這是北京，是祖國的首都啊！」猶在耳畔，真乃情何以堪！

為此，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衛計委作出回應：責成北京市衛計委認真調查「號販子」事件，嚴查醫院「內鬼」。3月5日，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更在全國人大開幕前的「部長通道」面對大庭廣眾斥號販子，她說：「我要感謝那位女孩，她的一聲怒吼，推動了號販子這個老大難問題的解決！」李斌認為，號販子問題深層次還是醫療的結構性矛盾，要會同公安部門一起整治。據悉現在京、滬、粵都採取行動，保持高壓態勢，全面實行掛號实名制。

為什麼大多數老百姓怨聲載道大喊「看病難」、「看病貴」，從上述這一小小細節或可找到端倪！

中華自古有「醫者仁心」、「欲救人而學醫可敬，欲謀利而學醫可惡」的醫德，白衣天使治病救人更是現代人銘記終身的觀念。何以時至今日，全國在大力構建精神文明、和諧社會、公平正義的今天，堂堂的首善之區竟頻頻上演如此匪夷所思的鬧劇和醜劇？更毋論其他地方了！

關鍵是存在內鬼！這又讓我想起臭名遠揚的票販子來。眾所周知，在各地火車票銷售點，長年活躍着一批大量囤積票源、隨時可將手中車票高價賣出的票販子。去年國慶之夜，筆者從青島返回鄭州，售票廳黑壓壓的長龍讓我不寒而慄，只好在大廳徘徊碰運氣等退票，等了兩個鐘頭希望撲滅，只好買一張高價票——原價238元的硬臥竟被索要660元！

記得那個票販子身材瘦小，只有18、19歲模樣，穿着很簡樸，頭戴舊棉帽，他主動靠近我問「要票嗎？」，我問他「有鄭州的嗎？」他摸摸舊棉帽說：「全國各地都有，我有點懷疑，這麼一個孩子能有多大能量呀？誰知他詭秘一笑，吹了兩下口哨，不到一分鐘像變魔術般閃過一條黑影，又瞬間消失，他真的摸出一張去鄭州的臥鋪票。我登上列車，心中直嘆：「這『黃牛』夠厲害！」

年年春運，年年打擊票販子，但年年黃牛黨出沒。不久前竟讀到一段評



內地的醫療制度存在不少問題。網上圖片

說，氣得我咬牙切齒。其云：「黃牛的出現是非常符合市場規律的事，許多民眾寶貴時間資源被浪費在排隊上，他們將火車票的實際價值以貨幣的形式達到最高級價格，大量願意以貨幣換取時間的消費者造成了黃牛黨的出現，黃牛黨則使無法購到票的旅客得以順利返鄉……」

真是一派奇談怪論！不知這位作者之言是何用意，我懷疑他不是「黃牛黨」的親友就是為票販子提供票源的「金主」！與各大醫院號販子屢禁不止、成為頑疾一樣，各地「黃牛黨」屢打不絕的根源就是埋在暗處的「金主」——內鬼了！

嚴查醫院和車站的內鬼，不讓他們有藏身之處、斂財之本才是最最重要的！有人說內鬼難查，這是一種低級遁詞。試問：醫院的專家號、車站的票源掌握在誰手裡？如今掛號、買票又是實名制，如果沒有內鬼「作祟」，號販子、票販子徒有大本事也絕難變戲法似的手到擒來啊！

非常明顯，內鬼難防逃不出三大原因：一是利益的輸送與交易。二是管理的混亂與放任。三是監督的缺席與失控。

欲徹底查處內鬼，並不難！首先必須認識到：黃牛黨行為屬於犯法。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款明文規定「倒賣車票、船票，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票證價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199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74次會議通過並公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也於當年9月14日施行。

既然「黃牛黨」屬於犯罪，公檢法部門就該依法查處，以現今的高科技偵察手段，查辦內鬼實乃輕而易舉的事。一些醫院和車站的黃牛黨之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令人疑心是內鬼們受到領導庇護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待遇，這又是嚴重的瀆職、失職乃至同流合污了！

更令人吃驚者，號稱鐵眼、鐵款、鐵算盤的銀行也出現了內鬼。

我的朋友老高，去年在購買銀行理財產品時也遭遇到「陷阱」，他三年前的一筆20萬元存款竟然變成了一份保單。銀行員工當時向他推薦一份收益很高的定期理財產品，卻沒有告知他是一份保險合同，期限也由自己要求的5年變成10年。我的一位親戚的存款更是無故丟失了。後據查實，竟是銀行員工為一己私利，以各種「高貼息」、「高佣金」、「高收益」等方式吸取儲戶資金，然後再加以私用。最近還爆出杭州聯合銀行42名儲戶9,500多萬元被盜案，而調查結果是，這筆巨款在存入銀行的利那就被轉賬走了。「內鬼」之厲害，令人驚詫憂憤！

有道是，外賊好擋，內鬼難防。這些「家賊」熟悉操作流程，監守自盜可謂輕車熟路。「內鬼」的頻頻出現，是相關部門責任的缺失和對公民利益的漠視，也是相關法律不夠健全、違法犯罪風險低而收益高所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各部門嚴加監管，不給內鬼方便之門，徹底斬斷其犯法空間，除邪懲惡、嚴刑峻法，則任何「黃牛」也難以得逞了！

字裡行間

黃仲鳴

學術暢銷有何不可？

剛寫完了《師門辱教記》，偶翻魏英傑的《書山尋路》，看了其中一篇《羅爾綱：為學但在「不苟且」——讀〈師門五年記〉筆記》。《辱教記》和《五年記》是同一部書，為何有兩名稱？

1958年，胡適在台灣把這本書改名為《師門五年記》，自費出版，作為生日回禮分贈朋友。胡適改「辱教」為「五年」，自有他的道理，「辱」只是羅爾綱的謙卑，但如何有「辱」了？胡適溫厚也，實是改得好。

早在羅爾綱寫成這部小書時，胡適於1948年給他的信說，這本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5個名譽博士更多。有徒如此，胡適確老懷大慰。

羅爾綱的考證功夫，深得胡適的教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不苟且」，這都是做學問的方法和態度。現時所見一些新聞學史的著作，都說上書太平天國獻攻上海、署名黃曉者，實為王韜。他在寫這篇論文時，胡適認為證據不夠，叫他補充，並囑咐不要急著發表。羅爾綱幾次反覆考證研究，並加以重寫，胡適看了，認為證據充足，結論站得住，羅爾綱那才公佈天下。於今，黃曉即王韜已成鐵案，但有誰還記得是羅爾綱的辛苦求真？

「書山尋路」，羅爾綱已「尋」到路。魏英傑這書，談書談人，在他來說，是在書山中，搜尋可讀可記的感受。這些「感受」，有時卻流於狹狹，如《史景遷：學術與暢銷的密謀》，指責出版商將史景遷的作品冠上「學術暢銷書」來宣傳推廣，並說：「我相信史氏採用敘事性寫作，本意是以更為樸素的方式重構歷史本原，而並不單純追求好看，更不是為了暢銷。」這只是魏英傑的「相信」、「大膽假設」，並無實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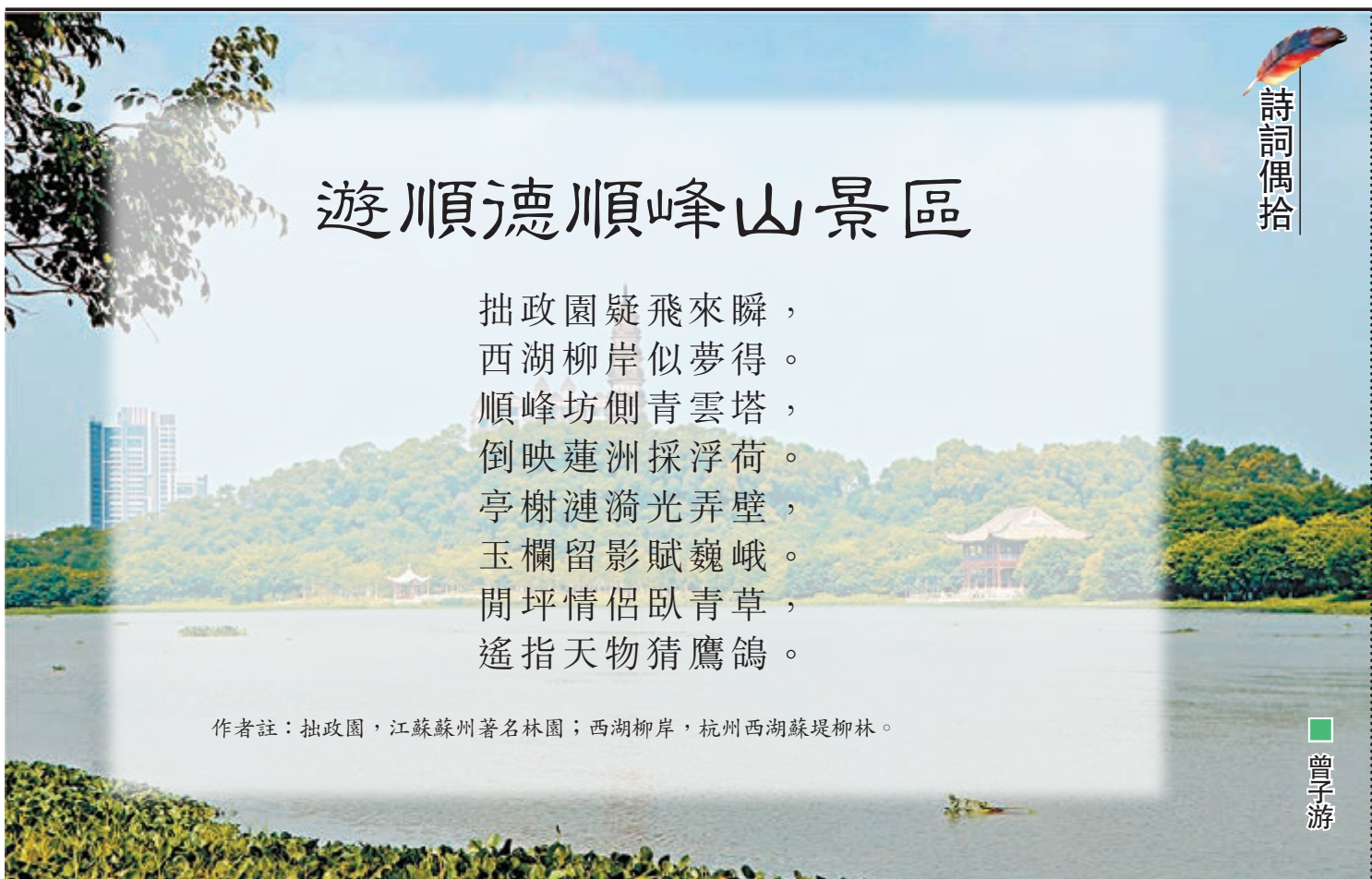
史景遷以新方法來說史，靈感當來自司馬遷，由他取的漢名「史景遷」便知。國際學術界有指他的作品是「野狐禪」，但無否定他的學術地位；他寫的書無可否認「好看」，逸出了枯燥、死板的論文之軌，可成為學者愛看、普通讀者愛看的作品，既愛看那就暢銷，那有何不可？

學術扯上「暢銷書」，我認為好極了，一點「厭惡」也沒有，魏英傑說：「讓學術歸學術，暢銷書歸暢銷書，市場歸市場——就像那些聰明的圖書分類員，不會把《文化苦旅》放到學術類架上，也不太可能將《皇帝與秀才》擺到暢銷書位置一樣。」這番話曖昧不清，史景遷的著作是「學術書」，當然放到「學術類架」，又怎會擺在「暢銷書位置」上？放在「學術類架」而暢銷，那有甚麼問題？既然暢銷，擺在「暢銷書位置」，那又有什麼問題？不要將學術自封在象牙塔。

說回《書山尋路》，可讀篇章其實不少，如說及香港的《金庸：改革與大眾化啟蒙運動》、《董橋：再現文字之美》，都得我心。金庸的「俗」，董橋的「雅」，都是暢銷書。

讀書有徑，寫作有門，各行其路其門，俱能暢銷，有何不可？

雖有偏狹，《書山尋路》的可讀篇章卻不少。 作者提供



遊順德順峰山景區

拙政園疑飛來瞬，
西湖柳岸似夢得。
順峰坊側青雲塔，
倒映蓮洲採浮荷。
亭榭漣漪光弄壁，
玉欄留影賦巍峨。
閒坪情侶臥青草，
遙指天物猜鷹鵠。

作者註：拙政園，江蘇蘇州著名名園；西湖柳岸，杭州西湖蘇堤柳林。

詩詞偶拾

曾子游

龔敏迪

來鴻

劉傳福

夢裡蒲草格外香

隨著端午臨近，節日的期待如同小溪裡的蒲草，和着輕快的音符瘋長在記憶深處。

「五月五，過端午，背個竹簍入山谷。溪邊百草香，最香是菖蒲。」時隔30年，母親教的這首童謠，依舊歲歲年年5月前後情不自禁地從心底唱起。

母親教唱童謠的那年月，是在老家一道彎彎的小溪邊。小溪離我家屋子不遠，屏住呼吸都可以聽見溪流潺潺流淌的聲音。如今，溪流已不再，不絕於耳是孩童們同唱的那首經典不老童謠。

記憶中的那條小溪，遠道而來，一年四季芳草萋萋、暗香浮動、水流不斷，穿過村莊一直流向我家屋後，再一路清唱而去，流向不知名的下游。

端午節的前一天下午，母親背上一個大嘴巴的背簍，帶上我來到溪邊。簡單囑咐幾句後，她便用鐮刀劈開一條小道，鑽進比人還高的蒲草叢裡，小心翼翼地割着蒲草。而我，則悄悄溜進小溪裡，使出渾身力氣搬開一些光滑如玉的石頭，淘氣之餘捉弄幾隻來不及躲藏的螃蟹四腳朝天……

不知過了多久，母親叫喚着我的乳名返回，背着一大簍蒲草，手裡還拿着一把青

藤。趁着朦朧的夜色，母親牽着我的小手一路哼唱着童謠回家。

昏暗的煤油燈下，母親用剪刀撥去幾朵大大的燈花，在院壩攤開蒲草，草尖上的露珠晶瑩剔透，一陣陣清香撲鼻而來，沁人心脾。母親用青藤將長短不一的蒲草紮成把，然後整齊地立在背簍裡，準備第二天一早背到集市去賣。

過節的那天早上，我一覺醒來，母親已經賣空了蒲草歸來。背簍裡，是她將蒲草換來的錢置辦回來的菜、肉等過節必需品。如今回味起來，還是滿背簍的溫馨和期待。

一晃眼三十年過去了，過節還在延續。然而母親老了，背簍壞了，鐮刀早已鏽跡斑斑不成樣子，母親也多年沒再割蒲草換錢了。

可惜村裡的那條小溪，不知何時因早已不復存在。為了工作，我們背井離鄉，蒲草那濃濃的香味，事到如今只能回味。端午臨近，往昔的念想因久違的蒲草變得更加濃烈。今年過節，老家是否會有一把香噴噴的蒲草掛在門庭陪伴父母？

夢裡，那溪依舊在流淌，蒲草青青格外香。

試筆

陳穎琳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那一天，我重新認識了他

於我，他是一個自私、不幫助別人和容易得罪人的人。但我從他參與義工活動中見到另一個不一樣的他。

我報名參加了青年空間的義工活動，在暑假中，我將會每星期到老人中心一次，教導長者使用電腦和平板電腦。一位義工負責兩位長者，而一班有20位長者，換言之有十位義工。

這天是最後一次上課的日子，我如常地提早15分鐘到達老人中心準備電腦。所有義工都在上課前10分鐘到達，了解上課的流程。在門口帶領義工進入電腦房前，我一眼便認出他來，他的性格令他在學校樹立了不少「仇家」。我走了過去，對他說：「噢！允行，你參加了義工活動嗎？你之前可是個不幫助別人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搖搖頭說：「對呀，在網上看到有關幫助別人能令自己更快樂的文章，於是就報名參加了。」

這堂課是我教導得最不專心的一次，因為他和兩位長者經常發出笑聲，令我開始反思到底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叫他留下來和我一起收拾工具，我問他：「我看你和長者相處得不錯，不如你登記成為長期義工，達到一定服務時數還可以獲得主題公園免費入場券。」他回答：「好呀！這次經驗令我對長者的反感大大降低！」臨離別前，我們還交換了聯絡電話，直到現在，我們還在聯絡哩！

義工活動真的改變了他不少，他變得開朗健談，還認識了不少知心好友哩。亦令我重新認識了他。

古典瞬間

罪己詔欠一個道歉

宋徽宗讓童貫去征方臘時對他說：「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也就是給了他以皇帝名義行事的權利。但他大概沒有想到，童貫會一到前線，就「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己詔。」直說了，就是他以宋徽宗的名義寫了一份罪己詔。後來王黼選為此在宋徽宗面前使壞，說童貫在其中：「入奸言，歸過陛下。」這篇文章對於瓦解方臘陣營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事前，方臘尖銳地指出朝廷：「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這是極具鼓動力的，董耘既要消除其影響，又要顧及矯詔擅自歸過於皇帝的後果，所以不容易寫。只可惜這篇文章沒有被留存下來，今天無法欣賞了。

有人說，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似乎皇帝是不宜承認錯誤。但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文帝頒佈過罪己詔。政法大學學者蕭瀚，從史料中找到唐太宗的罪己詔居然有28份之多，漢文帝、唐太宗當然不是亡國之君。不過，無論是唐太宗的自覺，還是宋徽宗亡國前真的頒佈了罪己詔，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承認錯誤，表示反悔的同時，對於受害的百姓或者當事人，卻沒有一句道歉的話。歷史上不少冤假錯案平反了，也很少有對受害者道歉的。

蘇東坡曾提到唐宰相陸贄，勸唐德宗「罪己以收人心」。興元元年(784)，唐德宗痛下《罪己大赦詔》，承認「朕實不君」後，居然「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然而真實的代價是赦免了叛亂的藩鎮，正如幾個惡棍遊戲中不得不作出的妥協，士卒和四方人心慶幸的是暫時逃脫了厄運。晚唐背負了沉重的積弊包袱不能擺

脫，關鍵是要給百姓以希望，從而扶植起正義的勢力。如果像陸贄那樣，拒絕所有來京城辦事的官員的禮物，唐德宗還派人勸他不要太過清廉，收受一點也無關緊要。他自己也經常派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門以及地方公開索取，稱為「宣索」，恐怕罪己詔下得再多，也只能令人厭惡，因為看不出他對執政的過錯，以及造成的後果有什麼歉意。

《新唐書》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歷來都是如此，君主能夠承認有錯，已經足以令人振奮。如果按照孟子的說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那就不對了，最起碼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那麼，君傷害了民，除了承認錯誤，還欠一個道歉。事實上道歉是不可能的，這也說明，皇帝的時代，民本思想也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所以平反冤假錯案已經是莫大的恩賜，也許還可能回答受害者說，在當時還有那樣做的必要性。這並不是天方夜譚，受其影響，類似的事甚至在「右派」平反的時候就還出現過。

罪己詔雖然也有幾分承認錯誤的勇氣，比起連罪己詔都不願意下的總要好一些。但自從有了詔書以來，直到袁世凱，罪己詔往往不是權宜之計的欺取人心，就是臨時抱佛腳抓救命稻草。因為他們不懂要對受害者道歉，只是後悔帶來了對自己不利。於是對於百姓來說，討要一個道歉，也就變得重要了。即使是一個文治武功多麼偉大的君主，難道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般的有了這麼多人犧牲，才有了他的豐功偉績嗎？更何況是碌碌無為的庸人。給人們造成了傷害，人們也應該討要一個道歉，那才是比較正常的。